

編完8月號，2017年又過了大半。未來兩期，我們將推出「十月革命百年」和「宗教改革五百年」專題，歡迎讀者來稿，又或是提出意見，俾使內容更為充實。

——編者

#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## 「一國兩制」的發展性難題

香港回歸二十年，回歸時刻的「命運焦慮」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消解了，而是得到了延續甚至激化，香港泛民主派及青年本土派在精神深處的不安與躁動更形加劇。從2014年「白皮書」框架開始，中國大陸官方試圖重塑「一國兩制」的歷史解釋權與發展主導權。但是，這種頗具國家主義雄心和國家理性底色的新論述和新方向，似乎在香港社會激起了更大的恐懼與反彈，香港人在反方向上建構出對抗性的「本土主義」。

「一國兩制」實踐中出現「國家主義」與「本土主義」的全新對峙，其憲制衝突強度已超過既往的「建制/泛民」及「民主回歸論」範疇。這些是怎麼發生的？兩制間的精神分歧是如何各自演變及加劇的？呂大樂〈尷尬的香港，仍在準備中〉一文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7年6月號）給出了中肯理性的回答。這一難題大致表述為：1980年代奠定的「一國兩制」及其《基本法》秩序，乃是建基於一種保守主義和兩制區隔主義的時代共識基礎上，以香港的過去和國家的現況為經驗根據，未能對1997年之後香港與國家的

各自變化及未來關係模式展開積極想像和建構，更無精神及憲制上的充分準備。

呂大樂將其難題細化為「五大尷尬」：其一，九七回歸的確切歷史與憲制性質未能獲得充分理解；其二，「一國兩制」的最大共識在於維持現狀，而不是尋求周全方案；其三，「五十年不變」逐步由保障變為束縛，妨礙香港社會應變更新；其四，「一國兩制」安排未能穩妥考慮和回應「代際正義」難題，無力應對青年世代訴求；其五，「一國兩制」缺乏前瞻性與發展性視野。

「五大尷尬」是參與「一國兩制」制度實驗的中港雙方共同的尷尬。回歸二十年，正是基於「一國兩制」在精神及內在制度方案上的不完備性，中港雙方各自遭遇重大的挫折：對中央而言，香港「人心回歸」始終未能解決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這類國家建構常規議題始終受挫，兩地融合更是遭遇香港方面的抵制；對於香港而言，政經形勢朝着日益不利的方向發展，既往的全面優勢和國際聯繫未能得到鞏固，政改之路艱難困苦，青年本土派激進攪擾，國家干預日益強硬。在互有挫折

的張力積累中，香港社會運動終於走向「佔中」對抗，繼而升級為旺角暴亂及港獨分離主張。這一發展已大大超出「一國兩制」固有範疇和底線。

呂大樂的「尷尬論」於香港或許是一種歷史與精神的真實，但在國家而言卻不盡然。國家決斷實行「一國兩制」固然有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局限，但其貫穿始終的國家理性基礎則從未改變：以香港獨特優勢支持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，為了國家發展利益而暫時擱置主權法理。這使得「一國兩制」背後的國家理論與國家建構方案變得相對模糊殘缺，造成了國家理性偏離國家理論的奇特安排。但國家從未忘記自身的主權身份與建構任務，故在面對香港社會的保守性乃至於對抗性的條件下，更加凸顯了國家建構的意志、法理與制度化努力，人大釋法及人大政改決定構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國家建構制度化成果。

呂大樂指出的「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一套站立於『一國兩制』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」的精神保守性與尷尬處境，仍難以看到改變迹象和路徑。「一國兩制」的「發展性難題」也許不在於國家無所作為，而

是香港需要一次嚴肅面對國家與主權秩序的精神大轉型，在身份認同之「國際」與「本土」之間續補「國家」缺環。

田飛龍 北京  
2017.6.17

## 1949年前已謀劃成型的中共新聞體制

賀碧霄的〈中共如何確立新聞體制？——建國前在香港的公開與地下討論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7年6月號）一文指出，1949年前夕，中共新聞體制早已謀劃成型，香港《華商報》只是爭取民主人士的前沿陣地，也是檢驗既定新聞體制反響的一塊投水石。

1948年以前，國統區的部分新聞自由，使國統區的新聞媒體不斷對當局的政策提出公開批評，致使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加深；1948年以後，國民黨試圖控制輿論，卻引起業已習慣於新聞自由氛圍的媒體人的強烈反彈，招致更多批評。共產黨則借力打力，為這種不滿推波助瀾，也乘機把那些持中間立場的媒體拉攏到身邊，並逐漸確立了新聞體制，它有以下幾點特徵：第一，報紙必須宣傳馬克思主義觀點，力圖防止「無組織、無紀律」現象；第二，新聞內容必須統一，這是共產黨最為重視的宣傳紀律之一；第三，竭力爭取一些中立媒體，如《觀察》與《大公報》等；第四，加強對舊媒體的接管改造，所有繼續出版與新創刊的報紙、刊物與通訊社，一律須向當地政府登記；第五，強調黨性原則，要求新聞媒體大量報導正面消息。

1949年4月，胡適在赴美的大海之旅中，揮筆寫下了〈《自由中國》的宗旨〉一文，特意對共產黨的新聞管制作過尖銳批評。胡適的評論，從反面證明了共產黨宣傳紀律的成效。

張仁善 南京  
2017.6.28

## 左派武鬥偏離「全國為上」作戰原則

黃震宇〈第三條戰線：「六七暴動」中的「經濟戰」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7年6月號）一文大量使用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和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館藏資料，整理出1960年代香港人口和經濟發展的脈絡，同時通過整合不同來源的材料，以說明當時勞工就業狀況和罷工的成效。

黃文以「戰線」形容左派和香港政府之間在經濟方面的角力和互動。從宏觀角度而言，「六七暴動」可謂中、蘇、英、美角力的一個小戰場；從微觀角度而言，就是本土左派與香港政府的鬥爭。中、蘇、英、美就「六七暴動」的取態甚為清晰，相對而言，本港左派與政府之間抗爭策略的具體操作，相關的研究較少。黃文正好為這幅拼圖補上重要的一角。

文中論及左派在1967年6月為了增加罷工聲勢，不惜使用銀彈攻勢以吸引工人加入罷工行列，向罷工者發放慰勞金，但是大規模的罷工和罷市行動未能達到預期目的——拖垮和癱瘓香港經濟，從而令香港政府屈服。於是，短期罷工變成長期罷工，慰勞金反而成為左派的沉重經濟負擔，所謂

「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」，這也預示了左派的經濟戰線的瓦解。其後，左派在1968年4月提出「罷工有理，復工有權」的復工運動，以減輕經濟壓力。可惜此舉未能奏效，於是又鼓勵罷工的工人轉工或改行，但左派的復工運動已為香港政府文宣攻擊的題材。

正如黃震宇指出，在冷戰的氛圍下資本主義陣營和中國的關係發展緩慢，香港是中國對外出口貿易的主要夥伴。據歷史檔案及各方資料顯示，中國方面如要強行收回香港亦非難事。眾所周知，當時中國掌控香港的主要糧食及食水供應，軍事部署方面更有其地理上的優勢，甚至英國政府也擬定撤離香港的方案。可是，中國以武力收回作為對外貿易窗口的香港並非上策，加上越戰的因素，中、蘇、英、美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，故此，在「長期打算、充分利用」的原則之下，中國政府並沒有在當時收回香港，甚至停止了對本地左派的經濟支援。經濟戰除了損耗香港政府和社會的經濟利益之外，對於中國的經濟利益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。在文宣、武鬥和經濟戰三條戰線並行的時候，如何令香港政府屈服而又不損害香港經濟基礎，從而繼續發揮中國對外貿易重要夥伴的作用，實是當時左派面對的大難題。當短期經濟戰未能奏效，左派以武鬥為鬥爭主軸，便已偏離了「全國為上」的作戰原則。

許崇德 香港  
2017.7.6